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叢書主編 李軍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元)張養浩 著 李鳴馬 振全 校點

張養浩集

張養浩集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叢書主編 李軍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元)張養浩著 李鳴馬振奎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養浩集/(元)張養浩著;李鳴,馬振奎校點.—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2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李軍主編)

ISBN 978 - 7 - 80702 - 743 - 0

I. 張... II. ①張... ②李... ③馬... III. 古典文學 - 作品集 - 中國 - 元代 IV. 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64088 號

Zhangyanghao Ji

書名 張養浩集

著者 張養浩(元)
校點 李鳴 馬振奎
責任編輯 徐潛 張雪霜
封面設計 李岩冰 柳甬澤
出版發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長春市人民大街 4646 號
網址 www.jlws.com.cn
印裝 長春市華藝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0mm×1230mm 32 開
印張 10.125
字數 300 千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38.00 元
書號 ISBN 978 - 7 - 80702 - 743 - 0

本書為國家“十一五”出版重點規劃
項目，受到國家古籍出版基金資助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編委會名單

叢書顧問：李修生 楊 鐌

叢書主編：李 軍

叢書編委：李 軍 李 鳴

邱居里 張文澍

鄧瑞全 韓格平

魏崇武 羅 超



序

1923 至 1927 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1]但是長期以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於種種原因，却仍有歧義。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績的，關於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沒有及時為文學學科吸納。文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 1987 年下半年，經所內同仁的討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1988 年 10 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准了《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的立項。1990 年 12 月，我們對於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全元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

[1]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總論元文化》，1927 年《燕京學報》；1934 年勵耘書屋原刻本；《勵耘書屋叢刻》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年重印。

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別集的整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編纂工作的，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18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一項用剪刀加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況和收錄文集的情況，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議定下一步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別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別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元人別集與明清兩代比較是少得多，明人別集有近萬種，清人別集在五萬種以上，但也有可觀的數字。根據蕭啓慶先生估算，元代儒戶可能有十萬餘戶^[1]。編籍在其他戶類的以及道釋也多有文化水平。可以說有條件編輯自己詩文成集的人，不在少數。元吳澄在《張仲默詩序》中說“近世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2]，也可以證明。編纂《全元文》過程中，我個人經眼的元人別集序、引、題、跋，約有一千二百篇左右，別集應在千種以上。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錄六百七十餘種。《全元文》收錄文作者三千一百餘人，文章三萬三千餘篇，文集詩文集二百種以上。《全元文》出版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鐸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已完成。楊鐸先生主編的《全元詩》於

[1] 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灣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版。

[2] 《全元文》14冊265頁，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

2002 年正式立項，實際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全元詩》共收錄詩作者五千二百餘人，詩作近十四萬首，其中收錄詩集在三百種以上。

說到元人別集的問題，這裏不能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元代的起訖點和什麼人可以列為元人？宋濂修《元史》，起訖為元太祖元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即：1206—1368 年。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亦同。我們編纂《全元文》時，就《全元文》的收錄原則請教啓功先生。啓先生說：“從道理上講，凡生活於元代，在元代寫有文章的，都可以收錄。宋金兩朝的人，凡是入元，死於元朝的人，都可列為元人，如牟巘，前人習慣列為宋人，實為元人，有趙子昂的墓誌為證。”由元入明，在元朝寫有文章的，也可以收錄。我們當時為了與《全宋詩》、《全宋文》、《全金文獻》、《全明文》等總集的編纂工作協調，對於收錄的範圍自我設定了一個時限。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由於傳統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見，一些由宋金入元，由元入明的人，多不列為元人，對於這類情況，還需要研究。由於看法不同，數字就會有較明顯的不同。但無論怎樣計算，元人別集的數量應在三百種以上是毫無問題的。

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完成，對於那一朝代文史研究的作用是大家公認的。但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不能替代別集的整理，而況《全元文》、《全元詩》編纂時，別集的整理也剛剛起步，目前已整理的別集還是少數。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一些出版社已開始策劃這方面的項目，有的別集已有整理本出版，我們《全元文》編纂的參加者，也已參與了這方面工作，參與整理之後，更感覺到別集整理的迫切性。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吉林文史出版社與我們一起提出了編纂這套《元人別集叢書》，並希望有一定規模。

從三百種以上的別集中，選出五十種有一定代表性的別集，經過整理編成一套叢書，是編纂這套書的初步的目標。只要求一定的代表性，不要求重要別集盡數收羅在內，因為有的集子不一定在這段時日

內能够整理出來，有的集子國內同仁已經出版整理本，我們《全元文》的參加者和合作的朋友僅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完成這方面的部分工作。根據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我們要求收入叢書的每部別集均應選擇收錄較全、錯訛較少的版本作底本，做好輯佚、校點工作；每部書都有前言和附錄。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詩文成就，以及版本流傳情況；附錄收錄作者傳記、唱和作品、詩文評以及別集收藏情況等相關文獻。

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苦的工作，高等院校教師一般都承擔着比較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在目前的考評體系中，古籍整理成果所占分值不高，因此，參加這項工作的老師們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然，這並不是降低對於我們的要求，叢書第一批書即將出版，我們期望國內同好的批評，更期望更廣泛的合作。元人別集的整理工作剛剛開始，我們相信這方面工作將逐步得到開展，以適應元代文化研究和當代文化建設的需要。

李修生

2008年11月立冬日寫於懋堂



前　　言

張養浩，字希孟，號雲莊、雲莊老人、齊東野人，山東歷城（今山東濟南市）人。生於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卒於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一生經歷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數朝。其出處大節、政事文章，皆為當代及後世所稱揚，是元代名臣之一。

張養浩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平民家庭，其曾祖以上的事跡已經無考，所可知者是其祖父張山曾經從戎，其父張郁則棄儒從商，因此積蓄了一定的資產，為張養浩的就學創造了經濟基礎。張養浩少年時期即勤學上進，刻苦讀書，有能詩之名。19歲時，張養浩創作了《白雲樓賦》，在濟南聲名鵲起。其文學才華得到了山東按察使焦遂的欣賞，第二年（1289），張養浩在焦遂的推薦下，出任東平學正，開始步入仕途。

在任東平學正期間，山東副廉訪史陳英（字彥卿，1247—1320？）對張養浩很是賞識，推薦他到京師改任掾吏。學正屬於低級教官，教官的前途是黯淡的，歷代都被稱為“冷官”，在元代尤其如此；而由吏入仕，則是元代入仕的一條捷徑，許多高官都是通過這條途徑而位居通顯的。張養浩聽從了陳英的建議，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來到京師，向時任平章政事的忽木（1255—1300）獻書，以尋求出任吏員的機會。忽木讀了他的文章後認為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對他勉勵有加。在陳英和忽木的推薦下，張養浩被辟為禮部令史，開始了他由吏入仕的宦途。

張養浩在禮部令史這個職位上工作了五年，大約在成宗大德元年（1297）前後，他轉任御史臺令史。到大德四年（1300），又轉任中書省令史。在任吏員期間，他兢兢業業，忠於職守，得到了忽木、董士選等大臣的贊許。

大德九年春（1305），張養浩由中書省令史選授堂邑縣尹（堂邑今併入山東聊城）。至此，張養浩完成了由吏到官的身份轉換，官雖小，但對於他的人生歷程來說，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所以張養浩到任後

盡心於行政事務，取得了非常好的政績。黃潛追記其政績曰：“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讐服，而盜賊化為良民^[1]。”在他離任若干年後，堂邑父老還請著名文士元明善撰寫《去思碑》，表達對張養浩這位父母官的感戴。

大德十一年（1307）冬，張養浩被召回京城，任太子文學，次年，武宗至大元年，又改任監察御史。監察御史的職責是監察官員的不當行為，指出朝政的闕失。張養浩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反對武宗建立尚書省以搜刮民財，批評在此事上姑息懦弱的御史臺長官，並撰寫了長達萬言的《時政書》指摘時弊，由大臣到親王駙馬直到皇帝，皆在指責之列。他這種不知官場禁忌的言行為當權者所不能容，他先是被降為翰林待制，之後又被罷官。權臣們還想捏造罪名對他加以陷害，張養浩在朋友的勸說下，不得已改變姓名離京避禍。於此可見他當時處境的危險。

由於武宗很快去世，仁宗即位，張養浩得以復職，接着改任中書省右司都事。由此進入了其仕途最為順暢的階段。

仁宗傾心於漢文化，喜歡任用儒臣。張養浩曾是仁宗做太子時的文學侍從，所以也受到了重用。皇慶二年（1314），仁宗下詔開科取士。延祐二年（1315），元代第一次科舉考試舉行。恢復科舉考試是元代政治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朝廷對此非常重視，所以考官的人選也為朝野所矚目。最終朝廷提升張養浩為禮部侍郎，與元明善、程鉅夫共同主持這次科舉，從這項任命中可以看出張養浩在當時儒臣中的地位和聲望。這次科舉考試共錄取 56 人，其中頗多名臣。王禮《跋張文忠公帖》云：“某嘗求我朝科目得人之盛，無如延祐首榜……聞望之重，如張起岩、郭孝基；文章之懿，如馬祖常、許有壬、歐陽玄、黃潛；政事之美，如汪澤民、楊景行、千文傳輩，不勝枚舉^[2]。”可見一時之盛。當新進士登門拜謝座主之時，張養浩卻拒不相見，讓守門人示以手諭：“諸公但思至公血誠以報國，政自不必謝僕，僕亦不敢受諸公之謝也。養浩覆^[3]。”這種不培植私人勢力的公心，使得新科進士們大為歎服。

[1] 黃潛《文獻集》卷十上《張文忠公祠堂碑銘》。

[2] 王禮《麟原前集》卷十。

[3] 王禮《麟原前集》卷十。

延祐五年(1318)，張養浩官至禮部尚書，同年與元明善等人一起又主持了元代的第二次科舉考試。延祐七年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張養浩被委以參議中書省事重任，英宗又任命拜住(1298—1323)為左丞相，與張養浩同在中書。拜住為人正直，憂國忘家，張養浩對他推心置腹，盡力輔佐。二人都很受英宗器重。

至治元年(1321)正月，英宗準備在宮禁中以彩燈紮制鰲山來慶賀元宵節。正月初七，張養浩上《諫燈山疏》，勸諫皇帝不要做這種浮華無益的事。英宗見到奏疏，先是大怒，後又轉喜，說：“非張希孟不敢言。”^[1]“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台臣當諫，人皆得言。”^[2]命令停止紮制燈山，並且“賜養浩帛二匹”^[3]，以示褒獎。

幾個月後，張養浩以父老為由，辭官還鄉，結束了將近三十年的仕宦生涯。

張養浩的辭官顯得非常突兀。“親老”通常是辭官的一個藉口，是真實的原因不便宣之於口時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這時張養浩正處在仕途最為順遂的時期，是什麼促使他萌生了退意呢？也許是他經歷了諫燈山轉禍為福的事件後，意識到了官場的危險？也許是他嗅出了朝廷中潛伏的危機？對此，張養浩沒有進行過直接的表白，只是在《郊居許敬臣廉使見過》中含蓄地說：“從仕非不佳，其奈多掣肘。所以明哲人，往往去之陡。”示意明哲保身是他辭官的原因之一。即使如此，能在鮮花着錦的巔峰時刻激流勇退，仍然表現出了世俗之人難以企及的大智慧，其後歷史的發展也證實了他這一選擇的正確。兩年後，至治三年(1323)六月，平章政事鐵木迭兒被奪爵籍產，其黨羽怕禍及自身，很是不安。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大都途中，御史大夫鐵失等人勾結諸王，先殺右丞相拜住，後弑英宗，朝野震動。其後泰定帝即位，很快又誅殺了鐵失等人。在這場充滿了血腥氣的政治鬥爭中，張養浩似乎是有預見地避開了禍患。君子見機，這恐怕不是偶合。

從至治元年(1321)到天曆二年(1329)初的近八年時間裏，張養浩一直在家鄉隱居。他在家鄉構建雲莊(今濟南張公墳村)，築遂閑

[1] 《元史》卷一七五《張養浩傳》。

[2]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紀》。

[3]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紀》。

堂、處士庵、翠陰亭，收集太湖石，平時與鄉鄰、好友賞石吟詩、飲酒談藝，這樣的生活是逍遙舒暢的。其間英宗曾兩次以吏部尚書徵召，他都力辭不起。泰定帝即位後，徵召他為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他啓程赴京，中途又託病辭歸。其後兩年間，朝廷以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史、翰林學士徵召，張養浩一一請辭。泰定三年（1326），張養浩再一次拒絕了朝廷的徵召。文宗天曆元年（1328），朝廷又一次徵召他為翰林侍讀學士，他仍然堅辭不出。八年間，他通計七次拒絕了朝廷的召用。朝廷的重用，對他已失去吸引力，他的態度也顯示出了與官場的決絕。可是對於朝廷的第八次徵聘，他卻未加推辭。

泰定至天曆年間，中國發生了持續的大範圍的自然災害，《元史》載：“陝西自泰定二年（1325）至是歲（天曆元年，1328）不雨，大饑，民相食。”^[1]僅天曆二年，陝西和河南行省的饑民就達67萬戶，江浙行省饑民70餘萬戶，陝西行省的鳳翔府即有饑民19萬^[2]。在這種情況下，天曆二年（1329）正月，朝廷再次徵召張養浩，任命他為陝西行臺中丞，赴陝西負責賑災事宜。面對這次徵召，張養浩寫了《辭聘侍親表》，以母老為由推辭，但最終他沒有將這份表文上奏朝廷，而是在經過反復考慮後作出了復出的決定。這時，他所想的是“民苦饑饉，而吾寧忍不為之起乎”^[3]，完全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利害榮辱。

天曆二年二月，張養浩離開濟南赴陝西。三月底，張養浩道經華山，禱雨於華嶽廟，結果“夜乃大雨，雨二日”。四月二日，張養浩到任，再次禱雨於社稷壇，“雨復滂霈，滿三尺，禾黍皆自生，秦人謂之‘相公雨’”^[4]。對這些天人感應的記載我們不必盡信，但歷史上這種傳說往往附會在道德足以為世楷模的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讀這類記載。張養浩到任後，馬上殫精竭慮，一心賑災。他奏請朝廷發孟津倉的儲糧賑濟災民，頒佈“輸米授爵”之令，來徵集豪門大戶囤積的米糧，這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他還解決了當時緊張的金融問題。百姓買米所用的紙幣大多因使用已久而印記模糊，須到國庫換取

[1] 《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紀》。

[2] 《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紀二》。

[3] 危素《說學齋稿》卷二《張文忠公年譜序》。

[4] 張起巖撰張養浩《神道碑》，見本集《附錄一》。

新幣，貪官污吏們乘機刁難，只兌付原鈔面值的一半，使百姓大困。張養浩得知後下令允許持舊幣買米，並且以等值兌換舊幣，杜絕了舞弊的途徑。張養浩多方面的救災措施使災民的情況逐漸好轉，但三個多月不分晝夜的勞累加之災區慘狀對他心情的衝擊，使他一病不起，在天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溘然長逝，享年六十歲。文宗至順二年（1331），朝廷追贈張養浩爲據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張養浩的一生除去二十歲以前的求學時期，大體可以劃分爲出仕、歸田、復出三個階段。

張養浩步入仕途，在儒家人世精神之外，還有家庭的原因。在張養浩各時期作品中，多處可見其迫於養親、勉遵父命的陳說，如《萱草花賦》：“迫於養親，奉檄如燕”；《悼亡》：“伊余踐仕，實以親故”；《贈劉仲憲》：“向非親命須爲官，定買煙霞事耕廬”；《直省》：“三釜若非親有命，片帆應與世無心”；《辭聘侍親表》：“恪遵父命，黽勉仕途，降志趨榮，以爲親喜”等等，可見，家人的希望是他駐留官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卻對官場一直有一種疏離感，“野性嶢嶢不耐官，強顏塵土步邯鄲。移文久爲雲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歡。”（《客中除夕》）這是因爲他的個性很難與官場相融合。他真誠奉行着儒家忠君愛民的信條，對朝政極言直諫，不惜觸怒權臣甚至皇帝，這充分顯示了他迂直的個性。他不知道官場另有一種生態環境，雖然彼時的官場還不能說呈現出的是逆向淘汰的機制，但像他這樣的迂直之人最後總是要出局的，所以他最後的激流勇退是合乎其性格邏輯的一個結果。

如果張養浩僅僅是由仕而隱，那麼他的生活形態也還屬於傳統士大夫儒道互補的價值範疇，並沒有太多的值得評論的地方，但張養浩最後的復出，卻使他的行爲超越了儒道互補的模式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所謂儒道互補，其積極入世是爲了建功立業，實現個人的價值；其退居林下是爲了全身遠害，獲得生活的自由，都是以個人的利害爲出發點的。而張養浩的復出，既不是爲君，也不是爲己，而完全是爲了拯濟百姓，這種人溺已溺的精神境界是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的，仍然足以感動崇尚普世價值的現代人。

張養浩在思想上接受的是當代意識形態即理學思想，這在理學盛行的元代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他沒有對理學做過精微的闡發，他只是

一個理學信條的躬行者。在生活中，躬行往往比坐而論道更有難度。他曾說過：“臣焉以臯、夔、稷、契爲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爲法，儒焉以顏、孟、伊、洛諸公自期。”^[1]他確實作到了這一點。在張養浩生命的最後階段，他的思想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突破。赴陝西賑災途中所見淒慘景象，引發了張養浩思想的動盪。所作散曲《山坡羊·潼關懷古》中“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語，多少道出了中國自秦以降專制主義歷史的真相，這不是那些追求“主聖臣賢”的讀書人所能夢見的。雖然是文學語言，但表現出了張養浩對歷史深層意義的思考。

張養浩在詩文創作方面的成就也是比較高的。他少年時即有能詩之名，在他青年時代任掾吏期間，得以有機會向姚燧求教。姚燧是元代前期文壇的領袖人物，其散文創作師法韓愈，上追秦漢，以奇崛古奧來矯正宋末平直萎弱的文風。在姚燧的影響下，在元代初中期形成了一種學韓、學秦漢的審美趨向。張養浩非常推崇姚燧的文章，他的散文創作也受到姚燧很大的影響。張養浩的好友元明善比姚燧走得更遠，文章直接師法秦漢，風格更為奇古。張養浩師姚燧而友元明善，也成為這一時代風氣的倡導者之一。李叔魯翀在為張養浩的文集所作的序中說：“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杰也。”^[2]就是就這一點來說的。張養浩的《牧庵姚文公文集序》、《祭姚牧庵先生文》盛贊姚燧，行文也全是姚燧的風格。元明善稱張養浩的文章“氣盛”^[3]，這自然是張養浩追隨姚燧學韓的結果。

張養浩的散文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他與姚燧一樣，擅長撰寫碑誌，這類文章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傳記、序、記之類作品，文學性極強。如《驛卒佟鎖住傳》記敘驛卒佟鎖住從江西被販賣到漠北，後來又輾轉逃歸的經過，整個過程曲折離奇，令人幾乎難以置信。文中涉及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對元代平民遭遇、草原民族生活習慣等都有具體的描述，使得這篇文章不僅具有文學意義，同時對

[1] 見本集卷十五《重修會波樓記》。

[2] 見本集卷首。

[3] 見本集卷二十《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於元代社會、民俗、法律制度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也具有相當的價值。從文章整體的謀篇佈局以及敘述語言等等，都能够看出張養浩吸收了司馬遷傳記文章的寫作手法。再如《游龍洞山記》的片段：

……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暗，非燭不能往。即遣僕燃束茭前導。初焉若高闊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蒲伏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陻，且重以煙燧緘吻，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能出矣。余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為者，始獲脫然以出。既出，有泣者，患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亦陽懾為殆。

文中描述洞中歷險經過一節，純用短句，語氣急促，與一般遊記所用的舒緩筆法大不相同，體現出“奇崛”的特徵。同時，張養浩運用白描手法，寫出衆人被困洞中的窘狀及脫險之後各人的不同表現，摹寫極為生動傳神。晚明袁中道對這篇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因憶元張文忠公養浩一記，模寫光景，雜以詼諧，至今讀之，精神奕奕生動，誰謂元人遂無好文字也……此老是白香山一流人，故詩文亦清脫乃爾。”^[1]袁中道是晚明小品文大家，他的評價從一個側面凸顯了張養浩散文的藝術價值。

張養浩的文章雖是被稱為“淵奧昭朗，豪宕妥帖，辭必已出，凜有生氣”^[2]，其創作的不足之處，亦與姚燧相近。姚燧宣導古雅深邃的語言風格，以文章語言“幾乎古”為尚，張養浩的文章也具有類似傾向，其共同特點為追求古奧、重視雄深雅健，“論者以為養浩學韓以矯金、宋之弊與姚同，而學韓偏以怪奇為豪宕、語艱澀而不妥帖，亦與姚同”^[3]。

[1] 袁中道《遊居柿錄》卷十二，見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第1397頁。

[2] 李叔魯翀《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見本集卷首。

[3] 熊禮匯《明清散文流派論》第50頁。

張養浩的詩歌創作也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個人特色。元代詩歌發展的總趨向是反思宋詩以議論、才學爲詩的弊端，倡導學唐。但元人學唐的取徑卻多有不同，如趙孟頫、虞集宗尚盛唐，而元代後期的許多詩人則傾向於學習晚唐。張養浩的詩歌取法中唐的白居易和韓愈，在宗唐的時代思潮中顯得別具一格。張養浩的詩有平易和奇崛兩種風格，他歸田隱居階段創作的大量描寫隱逸生活的詩篇，如《我愛雲莊好》組詩九首，語言平白，情緒閑散，與白居易的閑適詩在格調上極爲相近；而《憫農》、《長安孝子賈海詩》等描寫民間疾苦的詩又接近於白居易的新樂府。他還有相當多的詩歌奇崛險勁，明顯帶有韓愈的風格，如《贈劉仲憲》，全詩一千餘字，押入聲韻，一韻到底，奇字險句疊出，是明顯的學韓有得之作。學習韓詩，與他在散文創作上學習韓愈的審美追求是一致的。論者謂其“風致瀟灑在元和、長慶之間”^[1]。實際是指他對中唐白居易、韓愈二家詩風的兼取，並不專指學習元白。總體而言，張養浩的詩沒有他的散文的成就高，這可能與他更致力於散文的創作有關。

張養浩傳世的著作有《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包括《三事忠告》，亦稱《歸田類稿》）、《三事忠告》四卷（單行）及散曲集《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一卷。《三事忠告》指《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和《廟堂忠告》，分別是張養浩對自己任縣尹、監察御史、參議中書省事的爲官經驗總結。這三個《忠告》最早被收入《張文忠公文集》中，並非單行。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廣西按察司僉事黃士宏合爲一卷刻之，總題曰《爲政忠告》。是爲單行之始。宣德六年（1431），河南府知府李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四庫全書》收入史部職官類。

張養浩的詩文集最早的版本是元順帝元統三年（1335）張養浩之子張引刊刻的《張文忠公文集》，共二十八卷，有李叔魯翀元統三年二月序。張養浩生前曾將自己的各類著作（包括詩、賦、文和散曲）匯爲一集，命名爲《歸田類稿》，李叔魯翀序亦稱《張文忠公文集》爲《張文忠公歸田類稿》，該本版心書名爲“雲莊類稿”，故後世亦有徑稱此本爲《歸田類稿》者。此本不收散曲，卷二十五至二十七爲《三事忠告》。

[1] 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本第750頁。